

# 有机农业全国第一是怎样炼成的

## 南水北调水源地河南南阳发展生态农业见闻

新华社郑州7月26日电(记者孙志平、林巍、甘泉)有机绿色农产品种植基地34万亩,占全国有机生产面积的1.5%;累计认证有机产品395个,占全国有机证书总数的1.2%……截至目前,河南南阳市有机农产品生产面积、有机产品认证数量双双居全国地级市第一。作为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地之一,南阳承担着“一渠清水送北方”的重要使命。近年来,当地立足生态优势,发展有机农业,走出一条“水清民富”的绿色协调发展之路。

### 调布局:让农民端起“绿饭碗”

在淅川县九重镇1.5万亩金银花种植基地,59岁的农民高敬森在承包的60亩花田中忙活。他告诉记者:“这里的金银花专门用来制作双黄连口服液。用的是灯光杀虫,施的是生态有机肥,全过程绿色种植。”

而在四年前,高敬森还在为让粮食增产想尽办法,化肥、农药轮番上阵。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成,保水质成为当地头等大事,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淅川县开始着手调整农业布局,改变种植结构。目前,形成以金银花、软籽石榴、花椒等为主的生态农业产业结构,生态农业基地每年新增4万亩。

淅川县是南阳市调整农业布局的一个缩影。南阳市农业局统计显示,目前,南阳市有机绿色农产品年产量16万吨,形成蔬菜、水

果、粮食、茶叶、中药材、食用菌、水产品、畜产品等8大类优势产品。

目前,丹江口库区森林覆盖率达53%,水库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以上标准。库区实现“水清”的同时,农民收入也显著增长。西峡县五里桥镇黄狮村的种植园里,密密匝匝的小猕猴桃缀满枝头。58岁的王志强正为小猕猴桃套上呵护袋,他告诉记者:“每亩猕猴桃纯收入一万多元,一亩园抵上十亩田。”

“通过调整传统农业布局,发展生态农业,不仅护住了京津人民的‘大水缸’,而且让农民端上‘绿饭碗’。”淅川县委书记卢捍卫说。

### 转方向:迈向“金字塔尖”

“有机农业第一市”如何炼成?南阳市农业局介绍,如果说南阳将调整布局、实现生态农业规模化作为打基础的第一步;那么转型升级、向着更高标准体系对标看齐则是关键的第二步。

在食品安全领域,比“无公害食品”标准更高的是“绿色食品”,比“绿色食品”标准更高的是处于金字塔尖的“有机食品”。南阳市2014年至2015年两年间,引进国内8家有资质的认证机构,累计认证有机产品(含有机转换)395个。

“这些证书是南阳市优质农产品的身份证和荣誉证,也是进入国际国内高端市场的

通行证。”南阳市农业局长王宛楠介绍。在国内外市场中,南阳瞄准北京、上海和欧美等具有更高准入门槛的高端市场,树立质量信誉和形象。当地专门制定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南阳水源地有机农产品进京(津)实施方案》;由南阳市政府参股的“中线渠首公司”投资3500余万元,在北京市建立6家“中线渠首有机村”有机产品超级卖场。

此外,南阳市还建立以市级检测中心为龙头、12个县区检测站为骨干,生产企业和批发市场为补充的“二级三层”检测监管体系,对市场销售农产品坚持“三级检测、四季不断”。数据显示,近两年,南阳有机农产品监测合格率达96%以上,省级例行监测合格率100%。

### 提效益:一二三产融合发展

在丹江口库区的田间地头、工厂车间采访,农民挂在嘴上的是“生态”,企业家谈的是“产业链”,这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。农业产业背后离不开产业链的坚实支撑——这是南阳市炼成全国“有机农业第一市”的重要内功。

西峡县双龙镇百果园产业园成立不到3年,就带动周边农户形成500多万袋种植规模。为啥农民积极性这么高?邓坪村55岁的种植户王海贤笑道:“菌种免费供应,一万袋就能收入三四万元!”

围绕香菇、猕猴桃、中药材,西峡县形成

“研发育种—标准化种植—统一收购—仓储物流—深加工—订单式销售”完整产业链。西峡县委书记孙起鹏介绍,仅以香菇为例,西峡县有100多家香菇种植专业合作社,400多家香菇保鲜库,29家规模以上加工企业,年产值20多亿元。

完备的产业链支撑对提升生态农业效益效果明显。一方面农产品深加工带来附加值提高;另一方面分工精细带动产业水平提升。“优选种植的软籽石榴每颗鲜果能卖20至30元;若经过保鲜库存储至春节每颗能卖80元,如果再对石榴果、石榴花等深加工每万亩又可新增收入2亿元。”河南仁和康源万亩石榴基地负责人李念峰告诉记者,随着乡村旅游的红火,观光采摘还将产生多重效益。

南阳市在实践中发现,一二三产深度融合,产业链完备,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是有效破解了农产品价贱伤农的周期律问题。猕猴桃种植户王志强说:“10年来猕猴桃的价格只涨不跌,现在全村3500亩耕地3300亩都种上了猕猴桃,农民越种越有信心!”

“只有农民收益的稳定保障,才有生态的持久保障。”南阳市委书记穆为民说,“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渠首和核心水源地之一,就是要把农业做成生态,把生态做成产业,通过培育生态产业集群,提升产业化水平,才能走出一条绿色协调、可持续发展的路子。一渠清水永续北送的同时,真正实现水清民富。”

# 唐山人穿越四十载的「那句话」

新华社石家庄7月26日电(记者任丽颖、李俊义、高博)今年54岁的唐山人张东义在4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中成为“地震孤儿”。几年前,他曾给父亲烧过一封很长的信。

“我告诉父亲,自己后来进入了他的生前工作过的唐山机车厂,成为那里技术最好的工人,获得过全国技术能手”的荣誉称号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我细致地讲述了我自己带着徒弟们钻到生产线上20米长的机车下,教他们识别组件。就像和他在谈话。”张东义说。

多年以后,他想告诉父亲:爸,我长大了。

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让数十万当地民众一夜间与亲人、朋友阴阳相隔。40年过去,失亲丧友的巨大悲痛在时间的抚慰中逐渐平息。然而,有什么是经过岁月的洗礼仍令生者不能释怀的?假如时光可以倒流,那些没有来得及说出的话是什么?

40年来,每年7月28日前后,王树斌就开始失眠,心里发慌,睡着了就会不断做梦。他不想回忆那段往事,往事却不由自主地在心头翻涌。

地震中,王树斌和妻子李金凤压在了开滦医院的废墟下,水泥梁压了一个小小的空隙,只伸进一根手指头,彼此只能触碰到对方的指尖。妻子的声音越来越弱,她告诉他,一定要活下去。逐渐地,对面没了声音。

王树斌后来在大地震废墟中创造了“8天8夜的生存奇迹”。当他被解放军营救出来时,媒体蜂拥而至为王树斌留下一张经典的地震营救照片。可有些东西,即使过了40年,依旧放不下。

每年的7月28日,王树斌都要去地震纪念馆,地震纪念馆转一转。然后,他会来到那片已变成绿地的开滦医院原址。亡妻生前喜欢色彩鲜艳的花,他就带着去,放在草地上,坐下来说一说他的心事。“那次正好有两只蝴蝶飞过来,落在了花朵上,我特别高兴,觉得是金凤听到了我的声音,后来我就哭了。”

40年后,王树斌最想对他的亡妻说三个字:我想你。



▲摄影师常青于1976年拍摄的王树斌被救出时的照片(资料照片)。新华社发

81岁的常青是一名摄影师,唐山大地震中许多经典的照片都是他40年前的作品。常青从小是个孤儿,1950年他参军,当年年底就上了朝鲜战场。

“战争年代,有半个小时看不到敌人的飞机就觉得好像缺点儿什么。我年纪小,战友们都待我像亲人。扔炸弹的时候可以趴在你身上,我们是患难与共的真感情。”常青说。

手里拿着和战友们的合影,老人骄傲地给我们讲述当年和战友们的种种趣事和历险,他们曾离战争的死神近在咫尺。然而一说到大地震,常青的声音小了许多。

“我一共有8位战友,他们转业后回到唐山,都在地震中不幸身亡了。我们一块在朝鲜战场上出生入死,战争中活过来的人却没有逃过大地震。”老人流下了眼泪。

如果时光可以穿越,常青想在大地震前跑到战友们的床前,向他们发出比曾经战场上的“战斗号”更响亮十倍的声音:“同志们!快跑!!”



▲王树斌(右二)与摄影师常青(右一)在王树斌家门前合影(7月10日摄)。新华社记者牟宇摄

地震遗址公园的纪念墙下,记者见到了专门从广州带着老伴儿、儿子和两个孙女赶来的78岁老人张寅山。他艰难地在24万震亡者中寻找母亲的名字,后来在孙女的帮助下,终于确定了位置——D3区上数第七块砖第六行第三列。

“作为家中的一员,母亲对我期望很高,任何机会她都让我抓住。因此12岁起,我就去外地念书了。唐山地震时我38岁,在桂林工作。当时回不去唐山,我心急如焚,一个月后才知母亲蒙难了。而真正回到唐山,已经是1979年。”张寅山说。

老人告诉记者,40年来,他一直觉得愧对母亲,没有尽孝,没有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,没有来得及告诉母亲他后来生活得很好,还在大学当了教授。

哪一句话是他最想反复对母亲说的?老人闭起眼睛,慢慢说了一个词:“妈!”

政府的支持不可谓不大,扶贫干部的工作不可谓不认真

# 这个“老牌”贫困村为何“扶不起来”

“我们上门服务,有时还是上午,他们就已喝得酩酊大醉。这边的人很习惯这样的生活。这是一个对幸福感知的问题。我们也很头疼。”

——大化县扶贫办原主任覃正荣

看见外面的人怎么生活,他们才会改变。或许第一代生活得不太好,但下一代一定会比现在好

——雅龙乡党委书记唐艳

本报记者董振国、李坤晟、夏军

去年夏天,第六个孩子出生后,韦爱连终于有了不能继续要孩子的念头。这位30岁母亲的理由很直接——家里仅有的两张老木板床勉强挤下夫妇俩和六个孩子,再没有空余之处。

韦爱连的家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雅龙乡一个叫盘兔的山村,离首府南宁车程不到200公里,却是广西最贫困的地区之一。

过去,基础设施被认为是盘兔村这样的贫困地区最大“短板”。但经过多年扶贫,“如今的屯通了路,依然不见起色。”当地一位贫困村村干部如是说。

政府的支持不可谓不大,扶贫干部的工作不可谓不认真,然而,许多“老牌”贫困村的贫困户,陷入年年扶贫年年贫的困境。

### “出去打工,我吃不惯大米”

沿着斑驳简陋的木梯,踏进传统的瑶寨木屋,宽阔的大屋,四角各放着几张挂着蚊帐的木床,宿舍兵营一样的格局,韦爱连的家就在这里。

屋子里,正在地上玩耍的六七个孩子,有一两个光着下身。包着白头巾的老妇人踱到了一边,点了一根旱烟,看着大儿媳应付外来者的问题。

韦爱连的丈夫有一个兄弟。两兄弟分开了家,母亲跟着弟弟过活。外人很难看出兄弟两家的分界。记者原本以为是一道木梁分开了两家,村支书韦伊恩连忙纠正,房梁那一侧的几张床属于两个堂兄弟。

一栋木屋里,没有遮挡的几张床,住下了4家人。韦爱连丈夫兄弟俩这一侧,只有四张木床和一个镶了穿衣镜的衣柜。过时的老衣柜是韦爱连结婚时的嫁妆。

韦伊恩说,盘兔村596户人家,贫困户有254户。别看韦爱连家一贫如洗,这在村里的贫困户中还属于中等水平。

在不种玉米的季节,做饭和看孩子是韦爱连一天的全部内容。分家后,1.5亩玉米地,一年种得七八百斤玉米,根本不能满足一家八口。每年韦爱连都要向外出的打工的亲戚家举债过活。“孩子不生病,一年借四五千就可以了。”韦爱连习惯了举债度日。

丈夫最远去过一次北海,帮人砍甘蔗,纯粹的体力活。这是夫妻俩加起来,唯一一次外



韦爱连(右)。

出务工。

“如果有机会出去务工,你愿意去吗?”

“我走不了。我走了就没人看孩子了。”瘦削的韦爱连坐在小木椅上,怀里的小六不耐烦地扭扭身子,她就撩起上衣喂口奶水。

“把孩子交给婆婆,你们赚了钱,给婆婆生活费,不更好吗?”

“弟弟不高兴。”

“那你在家看孩子,你爱人出去务工?”

“我身体不好,有时也需要他看孩子。他腰不好,人家也不要。”

“我们这里的人没有技术,文化不高。出去也很难找到很好的工作。去一些不太正规的企业做苦力,很多权益又得不到保障。一来二去,就没有了出去务工的动力。”村支书韦伊恩在一旁帮韦爱连解了围。

“借口!”大化县扶贫办原主任覃正荣在当地做了十多年的扶贫工作,他见过太多像韦爱连这样的贫困户,“找各种各样的理由,过一天算一天。”

“我们上门服务,有时还是上午,他们就已喝得酩酊大醉。这边的人很习惯这样的生活。这是一个对幸福感知的问题。我们也很头疼。”覃正荣说。

在交谈中,韦爱连一直认为,她脱贫的最大希望,在孩子:等孩子大了,赚钱养我,就能过上好日子。

如果不是家中居住条件实在有限,韦爱连肯定会生第七个、第八个……娘家老父亲最大的遗憾就是一辈子只给自己生了一个弟弟,但今年前段时弟弟因病去世,父亲已经没有生活下去的动力。

但大女儿才12岁的韦爱连没有想过,如果出去打工的孩子们没有拿钱回来,自己的好日子从何谈起?

至少同村的韦汉芬和韦建展没有这样的好运气。

高中毕业的韦汉芬差不多是盘兔村最有文化的中年人。早年有打工经历的他计算了一下,4个在外打工孩子,每个月给他上缴1万元并不困难。但现实是“不知道他们把钱花到哪里去了。”

51岁的韦建展,大儿子去了广东打工。大女儿也嫁到了外地。不过,大儿子总告诉他,自己赚的钱刚刚够花,还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了父亲。

不过,韦建展在外人面前更喜欢说的,是

骄傲自己生了四个儿子,比父亲多,比爷爷多,比爷爷父亲也多。

雅龙乡党委书记唐艳正在努力地寻找企业,为村里50岁以上的闲置劳动力搭建务工平台,她觉得像韦建展这样身体健康的中年人至少可以做物流配送。

韦建展想了想说:“吃惯了玉米。外面的大米,我吃不惯。”

听他这么说,唐艳不由得叹了口气。

### 脱贫的路往哪里去

唐艳履职不到一年,此前她在毗邻雅龙的六也乡工作。在六也乡,唐艳在老百姓中推广山葡萄种植特别成功,不少贫困户找到了出路。在雅龙乡,唐艳复制这套办法。

盘兔村第一书记韦建云介绍,大化县当地以喀斯特地貌的石山为主,土地十分贫瘠,选择种植可以在石头缝中存活的山葡萄,一大好处是不占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耕地。

但雅龙乡的情况并不乐观。至少在记者调研的盘兔村,韦建云说,年初,他带领村民去旁边的镇西村学习先进经验。去看的人很多,回来动手操作的却一个没有。

“过去种核桃,乡里有核桃管理员,你去说,他答应种、种、种。但回来就没下文了。”韦伊恩说。

比较和六也乡的区别,唐艳分析说,六也更靠近县城,信息更加流通;民族成分更多元,相互融合,老百姓的思路活络不少。

据韦伊恩介绍,在政策的扶持下,2008年,盘兔村开始种植山核桃,目前共种植1000多亩。从2016年开始,盘兔村开始引进山葡萄,目前种植了400多亩。

韦爱连家没有种植山葡萄。村里提倡用荒山种,韦爱连说,山上太远,她和丈夫身体不好,没有精力去种。

韦建展的理由是种植山葡萄容易,但管护太麻烦。如果不小心,被别人的羊吃了,那得不偿失。

“搞种植没那么简单的,没有技术根本发展不起来。”最有文化的韦汉芬也对种山葡萄不以为然。

现在让唐艳头疼的是村民积极性不高,盘兔村的山葡萄种植成不了规模,意义就不大了。“贫困户本身分散,一个屯有几户,就算全种山葡萄也很难成片。没有规模,那只是产品,不是产业。盘兔村的地理条件本来就不占

优势,如果做不成产业,企业也不愿意到山里来采购。”唐艳说。

比起种核桃、种葡萄,村民们更感兴趣的是养殖业。覃正荣解释:“种植业要好几年才能看到效果,如果有了天灾,或是市场变化,就是一场空。但养殖业是快钱,能很快变现。与种山葡萄相比,村民更喜欢政府提供牛羊鸡等家畜家禽。”

但村民发展养殖业首先面临舍舍不得的困境。

像韦爱连、韦汉芬全家数口人挤在整个大木屋一角,连人都挤不下,根本没有多余的空间养殖牛羊。独门独户的韦建展也表示,如果政府帮他把房子修一修,他愿意多养几只羊。

“政策是贫困户每户建房补贴18000元,但肯定需要他们自己筹一部分。”覃正荣说。但在盘兔村保守的村民对贷款向来是敬谢不敏。

从政府工作人员的角度考虑,发展养殖业的另一个风险是当地老百姓没有可持续再生产的意识,起不到脱贫的效果。

覃正荣曾为当地一为贫困户提供了种苗。村民把鸡养大后,卖掉,立马花了个精光。“正常的逻辑是他能够用这次赚的钱,再去买鸡苗,进行下一次投资。但当地人这种意识很薄弱。这绝非个例。”覃正荣说。

种植产业举步维艰,养殖业不具备基本条件,现在电商火热,唐艳开始思考是不是该把山里的米酒、腊肉、藕粉放到网上去。

但电商真能行得通吗?唐艳自己心里也没底,连盘兔村的村民。在村里,几乎很少有人见过世面,更别提回来带头发展家乡产业的能人。

对未来,韦伊恩也颇为迷茫:“我一辈子都在这里,也没见过外面是怎样。要我号召大家做事可以,政府有什么指示,我就怎么做。”

### 斩穷根,把孩子们都搬出来

扪心自问,唐艳知道在穷乡僻壤的盘兔村发展产业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如果有可能,她恨不得把村民们全部搬到镇上去,让外面的世界冲击村民们根深蒂固的保守意识。

这位80后乡党委书记相信,搬迁才能把世世代代的穷根连根拔起。“像刚才那一户,生8个小孩,觉得没什么不好。但在镇西街(靠近县城的镇上),没有谁家生8个孩子。只有搬走,看见外面的人怎么生活,他们才会改变,或许第一代生活得不太好,但下一代一定会比现在好。”唐艳说。

但现实却不是那么容易。首先,搬迁都是无土安置,要世世代代靠山吃山的村民告别土地,那需要莫大的勇气;其次是居住的问题,山里人孩子多,虽然自身居住条件不佳,但如果是政府主导搬迁,村民们对居住空间的要求,往往也比较高。

于是,问题又回到了如何在地理位置并没有优势的盘兔村发展产业。

覃正荣开出的药方是,大人可以不搬,先让山里的孩子都到县城读初中。

覃正荣认为,贫困村大多世代代穷居自然条件恶劣的深山,当前应以改变下一代“思想贫困”状态为重点,让他们在县城接受教育、开阔眼界,一旦他们年轻时接触外界文明后,便不愿再回深山。

“别的不说,最简单的就是卫生间。在城市用惯了干干净净的厕所,自然不会再习惯猪圈。对家乡的落后也有更深刻的认识。现在我们建厕所,他们也不一定会上。”

“这一代人思维都定型,很难转变。但下一代教育得到提高后,其他问题也就都解决了。扶贫,你给房子冰箱电视机都不难,但你给他们一台电视,坏了也就坏了。他们仍然买不起新电视。”覃正荣说。